

## 结 语

榎根 勇

本书收录的8篇论文，是我担任COE-ICCS环境研究会主任之职以后撰写的。为了明确展现自己在这段时间的思考历程，我仅仅做了改正错别字等极其有限的修改，就以写作时间为序把8篇论文的原貌呈现出来。本来应该把这些论文再行修订、出版一本我独特的《环境学》、期待广大读者意见的，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这么做。在此，我想暂且回顾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对自己担任COE-ICCS环境研究会主任5年来的活动做出总结。由环境研究会全体成员执笔参加撰写的、环境研究会的最终报告书《现代中国环境论》将另行出版。

我的专业是水循环（或者水文学），但却从未以环境专家自居。当然，环境问题的根本是水和能源，所以至今我与环境问题牵涉甚多。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我国发生了严重的“典型七公害”之一——地壳下沉。这是由过度抽取地下水造成的，所以，我也和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关联。由于这层关系，至今我还担任着千叶县的地壳下沉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。就与地下水相关的环境问题，我和本科生、研究生们一起在东京都、千叶县、茨城县、神奈川县、栃木县、岩手县、新潟县、富山县、熊本县进行了单独调查。我在文部省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的环境科学特别研究中担任了4年地下水小组的代表，在筑波大学担任了5年“地球环境变化特别项目”的代表。在日本学术会议中，我是“地球圈——生物圈国际协同研究计划（IGBP）”的日方负责人。我曾向环境厅提交过有关“确保健全水循环”的报告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迟疑于自称环境专家的原因是，我对迄今为止的环境科学、环境学还稍存疑虑。我国最初的环境研究是“公害提出型研究”。这种研究非常有社会意义，最近毒性有机盐化合物戴澳辛

(dioxin)、环境荷尔蒙等研究也在进行中。我曾经主张“由于地壳下沉的原因是过度抽取地下水，所以应该直接控制抽取地下水”而惊动社会。但是当时，我也没有自称是地壳下沉的专家。接着，我国进行了“公害解决型研究”。COE-ICCS环境研究会也致力于山西省碱性土壤的改良、煤炭火力发电站的脱硫装置、碱性土壤改良剂的问题。此外，迄今为止，有很多诸如环境经济学、环境社会学等在既存学科领域的延长线上进行的“环境○○学的研究”都在进行着。环境哲学、环境伦理学、环境物理学、环境化学、环境医学、环境工学、环境农学等书籍也出版了很多。这一事实表明：在全部学科领域中都进行着环境的研究。而且，在环境研究方面，由相关专业参与的“跨学科”研究的必要性被提出来了，这种类型的项目研究也在进行中。

但是，历经了以上环境问题研究的我在COE-ICCS发端时，抱有这样的疑虑：“仅仅通过跨学科研究最终有可能改善中国环境吗？要克服环境问题，还有必须要考虑的更根本的问题吧”。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有以下两条道路。

A 地域学→中国学→中国的环境问题

B 哲学→新的环境学→中国的环境问题

我是地理专业出身，被选为日本学术会议会员也是依托的地理学。因为这层关系，至今，我也认真地思考了地域学和地域研究，在日本学术会议上也曾经参加过这一问题的讨论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无论怎么考虑，按照A的研究路径都不能在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。所以，我毅然决心采用B的研讨路径。即建构我特有的环境学，并且以此为基础进行改善中国环境的研究。当然，我做好了冒险的准备。但是，在我还是助手的时候，曾经以职务方面的理由，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气候学

转向水文学。那时，我选择了“水循环”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，打造出独具个人特色的水文学。顺便说一下，现在的世界水文学就是以“水循环”为主题进行研究的。我的心情是“对 COE 的最后奉献”，其成果就是本书。

为了在“环境”方面拓展自己的思考，我具体采用了以下方法。首先，作为“环境”的非专业人士，我决心把对“环境”的疑问设定成“问题”，不管它们何等细微、何等困难。而且，阅读各专业专家的著述，努力得到让非专业人士也能够首肯的、之前设定的“问题”的“答案”。当然，我能预想到专家们的指责：“环境问题广泛涉及各个学科，所以如果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，就必须遍览相关领域专业学术杂志上的论文”。但是，在专业分化过细的今天，如果不是超人，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举几个我设定问题的例子，如“为什么必须要守护自然呢？”、“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？”等等都是。例如，对于后面一个问题，翻翻手边的字典，在《广辞苑》第二版修订版（1975）中有这样的记录：所谓利润指的是“一个企业的总收益中扣除所有的生产费用，即扣除地租、工资以及利息等后的剩余，成为企业家收入的部分。它是生产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”。此外，《大辞林》第三版（1989）中记载“企业中，总收入扣除所有费用（工资、地租、利息、折旧费）后的剩余。有的观点认为，它是在生产过程中、通过榨取劳动力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。”在理科思想下成长的我立刻就感到这些定义只是意识形态。“产业资本主义活动产生的利润，不是以自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而获取的吗？”，这是我当初设定的“问题”，在看到下述文字之前，我没找到能够接受的“回答”。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，“资本主义只不过是通差异性质使利润产生的体系，尽管如此，我寻求其背后的更为深远的原理”（岩井克人，2006）。我对脑、心、哲学也设定了各种各样的“问题”，以自己的方式探寻着“答案”。

5年的时光，看似短暂实则漫长。5年，可以

培养一位未来的医生，可以修完研究生院2年的硕士课程和3年的博士课程。非专业人士可以向专家转变。2003年撰写在 COE-ICCS 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文章“一位田野学者思考的环境”时的我，还不是专家，对中国环境问题实际状况还不甚了解，也没想过可以在中国进行环境研究的实地调查工作。只是，在我的脑海中杂乱地穿梭着环境危机、笛卡尔的二元论、后现代、现象学、现代化、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、中国共产党、环境改善技术、捐赠、共同体、自然价值、新学等等语汇。

在写作2004年度的 COE-ICCS 国际研讨会发表文章《关于中国和亚洲世界环境问题方法论的考察》的时候，我所设定的“问题”的“答案”逐渐变得要出现了。即那个领域的专家已经为我准备好了“问题”的“答案”。到对于我设定的“问题”的“答案”成为书面世为止，当然，一本书的出版需要几年时间，所以在时间上会有不同步的感觉，但是，我却感觉到和那个人在同时并行地进行着研究。即我感到“很多人同时并行地在思考着环境和自然问题，但是其成果还没有被总结成为新的环境学”。感知到这些，我勇气倍增。

因此，我把“关于中国和亚洲世界环境问题方法论的考察”和“环境改善技术体系化的基础”这2篇论文的日文版和中文版，以“现代中国环境论序说”为题编入同一本书。而这本书，是为200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 COE-ICCS 国际研讨会准备的“研讨资料”，引起了一定反响。这次研讨会环境分组的主题是环境研究会的最终目的，即“现代中国环境论的建构”，因为我认为在召开这次环境研讨时，有必要首先明确身为主任的我的观点。我为这次研讨会准备的另外1篇论文是“对现代中国环境论的邀请”，这是以爱知万博会为契机、整理我以前观点写就的。

“确保健全的水循环”与其它7篇论文性质稍有不同。它是在日本地下水学会2004年秋季熊本大会公开研讨会的基调讲演稿“寻求从水质、水量看到的健全的地下水循环——熊本地区的信息发送——”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。写完提交给环境厅的

关于“确保健全水循环”的报告书之后，在我的脑海中，“健全的水循环”发展成为“健全的自然”。此外，2004年8月实行的山西省实地考察的出发前夕，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，我以此为题进行了讲演。我把这篇文章作为资料列入本书。

根据以上提及的5篇论文，作为一般论的、以我个人方式进行的考察大致就结束了。其结论是，为了克服环境问题，有必要在“新知”的基础上构筑“下一社会体系”。需要构筑“下一社会体系”的，绝不仅仅是中国。日本、美国、亚洲、欧洲都同样需要。所以，我探寻“新知”的具体影像，在“自然和人类的综合”方面，进行了环境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理融合的尝试。其前因后果如本文起始部分所记。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，我遇到了能够成为“新知”模型的拉兹洛、威尔伯、清水等人的“新哲学”。在批判笛卡尔二元论的我看来，引入量子论的拉兹洛的哲学是光彩夺目的。

老实说，“丽江古城的环境论”不是有意识要产生的论文。2006年，在环境研究会帮助我工作的朱安新突然说，就算自费也想对丽江古城进行社会学的考察。我也在2005年夏天的实地调查中为丽江魅力所迷。小朱有如此的期望，于是，我决心作为环境研究会的一项工作，于4月上旬实施丽江古城调查。我与宫泽哲男同行调查。丽江古城是纳西族引以为傲的“水城”。由于我们两人的加入，调查的主题当然就由“社会学”变成了“水与社会”。宫泽由名古屋经广州飞往丽江。我和小朱在上海碰头，从上海飞往昆明，在飞机上，我们两人讨论之后，决定采用威尔伯的“万物理论”作为调查的方法论。在丽江古城，每天午饭后，我们一边进行着“三人研讨”，一边推进调查。

丽江古城调查之前，我们爱知大学的环境研究会成员已经结束了对山西省、云南省的概况调查。

但是这两项调查是事先没有进行商量单独进行的。小朱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乐观地认为遇到麻烦时总会有办法解决，但是由于听到在新疆的日本研究人员使用GPS调查时被当地政府发现、被处以罚金的新闻，我们对实地调查能进行到哪一步半信半疑。然而，我们虽然也带着GPS、pH测定仪器、导电率测定仪器，但是在调查中没有碰到任何麻烦。真不愧是每年有400万游客造访的丽江古城啊。

最后剩下的是“伦理性”的问题。工业资本主义这辆列车，被狂奔的“欲望”机车拖着，“伦理性”之类的刹车设备并不完善。东京大学的岩井克人教授说，目前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的体系还没有出现。如果这是真的，21世纪的人类只能做这辆列车的乘客。这辆列车必需的“伦理性”是保守主义重视的“传统、规范”，还是市民主义重视的“体贴”、“友善”，这是今后残留的问题。“环境问题必需的伦理”是用于2006年11月召开的COE-ICCS国际研讨会综合讨论的第1分组的“各研究会主任的基调报告”。

关于今后的问题，我考虑有必要建设21世纪基础数据库，它是在“新知”的基础上研究环境、保全环境的重要工具，它是免费的，可以使用多语种检索，是任由人们存取资料的“环境信息基地”。当然，这个“基地”中也要存储中国环境信息。作为狂奔列车乘客的人类，为了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，应该把教育和研究的中心转向“环境”。全人类都思考“环境”问题，行动起来“改善环境”，作为其工具，需要建设“环境信息基地”，为此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不为过。其存在价值应该远远超过宇宙空间站、弹道导弹防卫系统（BMD）等等。从“环境”的视点来看，世界是一个整体。有消息说日本政府要开始建构“日本版google”。我非常希望能在其中也设置上“环境信息基地”功能。

(朱安新 他 译)

